



明代笔记小说《张于湖误宿女贞观》、高濂传奇《玉簪记》中一些有趣的情节线索,在演变成昆曲时被剪除了。我重拾旧绪,于是在《道观情缘》这个新剧本里出现了南宋词人张孝祥,即金陵知府张于湖。原来《玉簪记》所贯穿的道具“玉簪”,是陈妙常、潘必正道观定情的信物,最后,因战乱而失散的潘、陈两家团聚,才知这支玉簪在双方家长指腹为婚时就交换了。这种宿命论的处理,当时为他俩道观犯禁行为起到了“合理解释”的作用,然而今天看来,这样做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反封建的力度。因此我在这个本子里大胆删掉了“玉簪”这条线索。

不过我的剧本里强化了“犯禁”这个动作,把它从幕后搬到了幕前。现在许多人对于恋人之间的同居,已经没有道德负担。我让陈妙常和潘必正大胆去爱,却绝不是始乱终弃。为了能够在一起生活,他们最后决定放弃高官厚禄,走向民间。我相信青年人所向往的成功和幸福的婚姻,一定是灵与肉交相辉映的。在戏的尾声部分,我设计了“新秋江”。著名折子戏《秋江》里,是由陈妙常“私奔”追潘必正,我们的新版则是让潘必正追赶出走的陈妙常。潘必正在追舟途中唱道:“富贵哪有真情好,知音更比官帽强”这两句词在演出中赢得青年观众会意的掌声,正是作者所期盼的。

对于才女陈妙常的性格,我没有让她停留在思凡、冲破藩篱的层面,而是让她进一步凭借自己的智慧,搬

掉爱情道路上的绊脚石。面对观主和官府的双重压力,陈妙常机智地隆起腹部假装怀孕,好不容易骗过白云观主潘法成和金陵知府张于湖的耳目,被允还俗,却又面对潘必正衣锦荣归、状元不得以三教九流为妻的难题。潘必正在“要乌纱还是耍妙常”的两难境地犹豫不决,使得陈妙常失望了,她揭示假孕真相,毅然出走。这一举动,如同当头棒喝,终于唤回了潘必正的爱心。

“如意珠儿切莫舍,牢牢握在我手心”,这是陈妙常和潘必正对待爱情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女性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变化比较明显,她们非但追求人性解放,而且追求人格独立。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她们的自主权和选择性大大增强,向往着主动进取的境界。另外,剧中三号人物张于湖,是一个有点“花心”的好官,他最后不计前嫌,虽然求婚未成,却愿意出来成全情敌,这也是一种现代意识。我的创作理想是:让陈妙常、潘必正、张于湖等穿着古装,走进当代青年的生活,讨论爱情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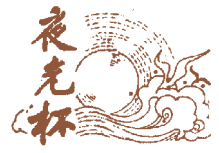
从《玉簪记》到《道观情缘》,在形式上的一个变化是强化了喜剧性。陈妙常以假孕调侃观主和知府、试探潘必正,构成本剧重要的喜剧元素。我让《道观情缘》的风格朝轻喜剧方向发展,也是为了呈现与京、昆、川剧所不同的越剧气质。庆幸的是,京剧科班出身的导演郭学文,身上有丰富的幽默细胞。剧中哑姑、衙役等“女丑”虽然不抹“白鼻梁”,却仍有京剧小丑、彩旦的诙谐和夸张;与此同时她们又不失女子越剧的青春美,为“轻喜剧”增色。

二十年前韩国诗人许世旭访问中国,我陪他去杭州和绍兴。许世旭是韩国著名的汉学家,不仅精通汉语,还能用汉语写诗歌和散文。那次,是许世旭第一次访问中国,一路上,他无法抑止自己的激动。他说,无数次梦游唐诗宋词的故乡,现在身临其境,恍如梦游。那几天,他随身带着一瓶酒,走到哪里都会喝上一口。在西湖畔,他喝了一口酒,说:“我想起白居易的一首诗”。我问他哪一首,他马上就低吟出口: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这是白居易的五绝《问刘十九》,也是我喜欢的唐诗。我曾经奇怪,这么简单的一首诗,没有什么情节,也没有惊人之句,为什么却让人回味无穷。诗中描绘的是喝酒的情景,也是对友情的讴歌和回忆。此诗又题为《同李十一醉忆元九》,是诗人在喝酒时回忆起一位叫刘十九的朋友。红泥小火炉上炖着热气腾腾的美酒,屋外虽然是就要下雪的寒夜,但和知心朋友在温暖的炉火前对酌,那是令人心动的景象。最后一句“能饮一杯无”,尤其让人感动,这不是强制的或者无节制的劝酒,而是带着关切的心情,轻声询问:你是不是还能再喝一杯?全诗随着这句询问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悠长的回味和联想。

《唐诗三百首》对这首诗有评价:“信手拈来,都成妙谛。诗家三昧,如是如是”;《唐诗评注读本》中评论:“用土语不入俗,乃是点铁成金手段”;说得有理。此诗中的“绿蚁”,现代人已不知何物。最初这两个字的意思,是酒上的绿色泡沫,又称“碧蚁”,后来则被作为酒的一种代称。谢朓《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中有“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之句,吴文英《催雪》中有“歌丽泛碧蚁,放绣箔半钩”之句,都是指酒。“红泥小火炉”,也是令人神往的意象,简朴中透露亲切亲近和暖意。许世旭回国时,我送他一把宜兴紫砂壶,他捧在手中端详了一会,喃喃说道:“这就是白居易诗中的‘红泥小火炉’吧。”白居易诗中的火炉,当然不会是宜兴的紫砂壶,不过许世旭的感觉没有错,紫砂壶的古朴和简洁,使他联想到白居易的诗中的情境和意象。

去年冬天,我受邀去韩国谈中国文学,许世旭来机场接我。当天晚上,在首尔热闹的明洞步行街,他找了一家风格纯正的韩国餐馆请我吃饭。餐馆里灯火幽暗,一个小火炉上,煮着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条,两个人举杯对酌,一杯接一杯,很自然地回想起二十年前西湖畔的往事。许世旭笑着问我:“能饮一杯无?”我们相视一笑,岁月的隔阂消逝得不见踪影。杯影晃动之间,分明有一个飘然的身影陪伴左右,那是白居易。



我写《道观情缘》

翁思再

掉爱情道路上的绊脚石。面对观主和官府的双重压力,陈妙常机智地隆起腹部假装怀孕,好不容易骗过白云观主潘法成和金陵知府张于湖的耳目,被允还俗,却又面对潘必正衣锦荣归、状元不得以三教九流为妻的难题。潘必正在“要乌纱还是耍妙常”的两难境地犹豫不决,使得陈妙常失望了,她揭示假孕真相,毅然出走。这一举动,如同当头棒喝,终于唤回了潘必正的爱心。

“如意珠儿切莫舍,牢牢握在我手心”,这是陈妙常和潘必正对待爱情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女性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变化比较明显,她们非但追求人性解放,而且追求人格独立。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她们的自主权和选择性大大增强,向往着主动进取的境界。另外,剧中三号人物张于湖,是一个有点“花心”的好官,他最后不计前嫌,虽然求婚未成,却愿意出来成全情敌,这也是一种现代意识。我的创作理想是:让陈妙常、潘必正、张于湖等穿着古装,走进当代青年的生活,讨论爱情的本质。

从《玉簪记》到《道观情缘》,在形式上的一个变化是强化了喜剧性。陈妙常以假孕调侃观主和知府、试探潘必正,构成本剧重要的喜剧元素。我让《道观情缘》的风格朝轻喜剧方向发展,也是为了呈现与京、昆、川剧所不同的越剧气质。庆幸的是,京剧科班出身的导演郭学文,身上有丰富的幽默细胞。剧中哑姑、衙役等“女丑”虽然不抹“白鼻梁”,却仍有京剧小丑、彩旦的诙谐和夸张;与此同时她们又不失女子越剧的青春美,为“轻喜剧”增色。

大道具小道具都登记好了,也把我登记晕了;连一只顶针、一只挖耳勺也得登记。交了誊清得匀匀称称林林总总的登记簿,佐临就给我一本《蜕变》的话剧印刷剧本,说:明天起你就做 Understanding——实习生。每天开戏,你都要看,要熟悉每个女角的台词和地位。在乐池看,在边幕看都随你。

吴仞之给我八块钱和十张澡票,说:“你的实习就从你到团那天算起,每月十五元,澡票十张。浴室霞飞路、南京路都有,你问问同事好啦。”我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寄母亲五元钱。我离北平时,娘给我二十元,生怕大哥一时养不起我吃饭。可我现在可以赚钱了。15÷30=每天可用五角钱。鸡蛋炒饭2角一份,一只大饼3分钱,油条也3分,功德林冬菇面3角,夜宵喝酸奶,每瓶2角,超支了,不吃就是了,可是夜里饿啊。汪谡告诉我,早上往热水瓶里撂一把米,到老虎灶一冲开水,晚上回来就成粥了。我买了一斤米,售货员奇怪地问我:“一斤?”“是一斤。”第二天早上就做实验,晚上回来有热粥吃了,没碗,用杯子吃,配吃久违了的上海小酱瓜,也没筷子,用嘴吮吸,用手拿酱瓜,吃得很开心。不过午夜后起夜,亭子间在一二楼之间,会吵醒人家的,此时不行。我把剩余的米给二楼亭子间小杨,小杨说:“想喝粥,我每晚给你烧。”“不行不行,你要么把这点米炒半焦了,我当零食吃。”

我把粥粥的壶很艰难地洗净,把洗壶水从窗口漏斗里冲下去。我要买碗筷碟勺吗?太复杂了。

1986年的夏天,早早地进入了酷暑。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还在大汗淋漓地“落实单位”。承蒙唐振常先生不弃,力邀我到她主持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唐先生豪爽挥洒,说话却诚恳实在。他说历史所在徐家汇,离市区是远了一点,但却有一个地理优势,就是紧邻徐家汇藏书楼,期刊、报纸、杂志收藏极其丰富,全国首屈一指,是一个大宝库。

二十年前,地旷人稀的徐家汇还没有脱去“乡下”的帽子。五条马路交汇处,除了肇嘉浜路上有个“六百”之外,华山路两边只有十几家单开间的小店。现在“美罗城”的位置上是简棚式的“徐汇区工人文化馆”,馆前空地上是“长途汽车站”。“港汇”的原址,大约要到90年代才开出了一家兼卖汤面和啤酒的三黄鸡店。历史研究所坐落于现在“东方商厦”的地方,借用的是天主教耶稣会的神学院大楼,和原来也属于耶稣会的藏书楼隔着一个小院。历史所是漕溪北路40号,藏书楼是80号,因为跳号,其实就是邻居。

和这座声名远播到欧、美、东南亚及台港地区教界、学界的著名藏书楼毗邻,确实

车过复旦大学东门外的国定路,同车的几个上世纪50-60年代的老大学生,不约而同回想起当年在此奋战“劳卫制”的往事。

“劳卫制”是“劳动保卫祖国制度”的简称,是一种各项体育运动必须达到的标准体系,好像还分作两级。谁达标,就颁发徽章一枚,与校徽并排往胸前一挂,尽管在潇洒今人看来非常“老土”,当年却显得非常神气。至于能否就此劳动卫国,似也不曾有过检验实证。

像当年除四害、打麻雀、批资产阶级“巨人”(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校园活动一样,奋战“劳卫制”采用的也是毛主席提倡的群众运动,时称“大兵团作战”。各个班级、年级以及各系之间还要展开竞赛,相互激励。校园生活的兵营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奋战“劳卫制”,班上总有那么几个难以达标

千禧大宏图

1979年,当我以一名访问学者的身份拜访美国斯坦福大学艺术历史系主任文以诚先生时,他拿出了一本台湾出版的印刷精美的画册,问我是否认识这位名叫刘大鸿的上海画家。我当然认识,他中等的个子,机敏的个性,年轻的他常到上海美术馆参加一些活动。一年后,美国古根

海姆博物馆馆长、文以诚教授,还有十分活跃的美籍策展人林似竹女士来上海开学术研讨会,与我约好了去拜访刘大鸿先生。他将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画在布面上,他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思考画在布面上,一直有越来越多的画商来买走他的画,一直有世界各地的美术馆邀请他去开画展,他的画被制作有限印刷品,有画商为他印制精美的画册,出版挂历。当我问起他,你知道自己的作品都被哪些画商收去,藏在哪里,是否能列张清单时,他一脸茫然。

如果说我国的经济正在腾飞,我国的各类商品正通过集装箱码头运往世界各地,我国的文化艺术产品也参与了外贸顺差。然而不是每个艺术家都有

这样的幸运,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抽象艺术家张健君以一万元人民币卖掉了他的一件作品,这在当时普通人工

这样的幸运,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抽象艺术家张健君以一万元人民币卖掉了他的一件作品,这在当时普通人工

这样的幸运,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抽象艺术家张健君以一万元人民币卖掉了他的一件作品,这在当时普通人工

奋战“劳卫制”

陆谷孙

“钉子户”:有跑步时上蹦胜于前行的;有男生跑不赢女生的;有爬绳及半臂力不支倒栽葱掉下,险些脑震荡的;有垫上运动向前连翻三个筋斗发现身体还在原地的;有跳箱(现在的跳马)腾跃不成,一屁股坐在箱上的……几个跑800米老不及格的女同学更惨,不管你出现低血糖症状,还是跑得一脸陶土色,只允你在运动场中央铺开的草席上休息一会儿,缓过气来,接着再跑。现在矗立着文科大楼的地方,当年是运动场。奋战“劳卫制”的那些日子,这儿彻夜灯火通明,锣鼓喧天,不达标的不得回寝室;达标的忙不迭去向党委报喜。于是就常出现跑道上一人疲步踟蹰,

这样的幸运,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抽象艺术家张健君以一万元人民币卖掉了他的一件作品,这在当时普通人工



红楼·黛玉 (油画) 刘大鸿

众读者开放。胡道静先生曾回忆说,他是结识了藏书楼的徐宗泽神父才得以进馆阅读的。1958年成为上海图书馆的分馆之后,因路途较远、藏书楼仍然不便利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田汝康教授家住沪西,有条件叩开藏书楼,退休后写成英文著作,在海外出版,颇有好评。徐家汇藏书楼,早年由于它独特的来历和迷宫一样的收藏,学者中间谈起来颇有些神秘,似乎难以接近。其实,在藏书楼的王仁芳、张伟、黄志伟、祝均宙等先生,都是非常敬业的爱书人,每次咨询,他们都非常热心帮忙解决。说起还有故事:80年代的时候,每个单位都有食堂。藏书楼员工不多,自己不开伙,就在历史所的食堂“搭伙”。同桌吃饭,彼此关系更加密切。

“文革”后,我校园里连续上了七 years 学,读书已是职志。毕业后与藏书楼毗邻,如老鼠掉在米缸里,如游鱼戏在水中。想来毕业当年之所以舍近求远,每周到徐家汇的历史所上班,徐家汇藏书楼也是一个权重因素呢。明请读一篇《中国徐家汇藏书楼拾萃 传统经典西译著作》。

气喘吁吁,拉拉队前拽后推,呼啸促进的胜景。人到了身体疲劳的极限,脑瓜子反而好使。也不知是哪位智囊出了个歪点子,把“钉子户”们从运动场拉到了国定路。这儿当年是荒凉仄径,旁观者稀,惟从北边偶尔传来几声苍凉的火车汽笛声;小桥往南是个斜坡,尤利顺势冲刺,再将百米距离悄悄缩点水,这样不少100米短跑不及格的同学,都是在这儿最后达标的。

这儿出租车正好驰过桥面,行驶在下桥缓坡处。前面出现大群学生,有骑车的,有步行的,考试业已结束,结伴去打牙祭的应该不在少数。校园生活尽管还有若干兵营化的遗形,毕竟华尔兹在代替广播操了。望着胸次开爽、英姿焕发的大学生们,车里的人在疑惑:历史果然会在遗忘中失落殆尽吗?



董建华和曾荫权(肖像印) 陈睿韬 篆刻

密切的关注。刘大鸿回顾往事,十分感谢他所在的浙江美院第一工作室,那里十分宽容的老师,鼓励同学张扬个性。当时那批个性很强的同学:王广义、张培力、阎萍,他们都以自己的艺术智慧与功力在艺术市场上获取了成功。

刘大鸿作为一名画家的同时,也没忘了作为教师的本分。他创立的“双百工作室”带领学生创作并出版了《上海百多图》。今年他又与学生们作“新点石斋画报”展览,他带着学生们用画笔描绘着上海。当年《申报》所属的“点石斋画报”主笔吴友如是白描记录上海,今天的刘大鸿则以油画的方式记录了上海。刘大鸿画中充满了跨越时空的想象,对历史与现状的幽默、调侃;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与鞭挞。刘大鸿的画在向世界展现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之外还向世界展现了我们的幽默与社会的进步与宽容。

实习生

黄宗英

是我读书生涯中的一次幸运。在徐家汇上班的几年里,我们几个所里同事是把藏书楼当作办公室的,有空就在那里查看报刊杂志、中外文书。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万国公报》研究,用的是台湾华文书局的影印本,其中有很多缺行漏页。《万国公报》是最早出版,延续时间最长的中文期刊,而全世界唯一一份全本收藏,就在徐家汇藏书楼里。后

是我读书生涯中的一次幸运。在徐家汇上班的几年里,我们几个所里同事是把藏书楼当作办公室的,有空就在那里查看报刊杂志、中外文书。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万国公报》研究,用的是台湾华文书局的影印本,其中有很多缺行漏页。《万国公报》是最早出版,延续时间最长的中文期刊,而全世界唯一一份全本收藏,就在徐家汇藏书楼里。后

毗楼为邻好读书

来编选《<万国公报>文选》,就近用来校对、补遗,取用非常方便。学者把珍稀资料视为生命,徐家汇藏书楼有珍本善本,全世界的朋友都会委托你找资料。这时候,与藏书楼毗邻就是一种特权。我曾经为老师朱维铮查找咨阁《西学东渐记》原文本,为朋友汪堂家查找辜鸿铭《春秋大义》初印本,还为比利时钟鸣旦教授查找《论语》拉丁文译本,为美国孟德卫教授查找《天儒印》……“徐家汇藏书楼”在解放前一般不向公

十日谈

徐家汇藏书楼拾萃 传统经典西译著作。